

中间地带的马克思主义传播

——1917—1937 年北京高校报刊史研究

林绪武

【摘要】 1917—1937 年,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北京高校,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和研究的重要场所之一,而北京高校报刊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载体和记录者。北京高校报刊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但更多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或一种哲学、经济学理论进行传播与研究;主要方式有演讲传播、图书介绍、译文摘录等,特点表现为间接传播为主、侧重学理探讨、差异性明显。北京高校报刊和部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性研究和传播,属于中间地带的传播,存在零散而不系统、局部而不全面等不足。

【关键词】 北京;高校报刊;马克思主义传播

李大钊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成立前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主要到工人中去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基于党的创建和革命发展的实际需要。而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高校,则成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和研究的重要场所之一。目前,学界有关民主革命时期高校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研究成果不多^①,从高校报刊视角探讨马克思主义传播尚无专文。因此,本文拟以部分北京高校报刊为主要文献资料,探讨 1917—1937 年北京高校报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以期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高校报刊史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

北京高校报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比起中共党报党刊迥然不同。这种不同点主要体现在高校报刊更多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或一种哲学、经济学理论进行公开传播与研究,探讨该学说或哲学、经济学理论的优点和不足,以及实践的可行性等,尤其是着重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

林绪武,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1)。本文系北京大学教育研究中心“北大研究”课题“早期北大校报史研究”(2022ZD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王刚、徐晓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高校的早期传播研究》,《理论学刊》2022 年第 4 期;杨丽、李宁:《1919—1927 年马克思主义在南京高校的传播》,《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2 期;李向勇:《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传播及其当代启示》,《毛泽东研究》2019 年第 3 期;裴植:《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马克思主义在高校传播的多维透析——以北京大学为个案》,《中共党史研究》2018 年第 8 期;李向勇:《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高校党建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 年第 2 期;肖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前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 年第 3 期。

学说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学术性。1930年前后开始,北京高校报刊登载的国内外有关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显著增加,除了对理论的学术性讨论之外,对其实践性的探讨明显增加。

(一) 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介绍与讨论

五四运动后,中国掀起了各种社会思潮传播的热潮,北京高校报刊对诸多社会思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讨论随之逐渐增多。

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绍与讨论。早在1918年,《北京大学日刊》就通过刊登蔡元培和李大钊有关劳工价值的演说,率先肯定了工人阶级的价值。蔡元培提出“劳工神圣”^①,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中更将劳工世界比作“世界的新潮流”“新纪元的创造”,且认为“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②

北京高校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至五四运动以前,但北京高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绍与讨论却主要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1930年3月,《燕大月刊》专门刊文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包含两种重要的观念:第一是辨证的观念,用一种进化及动的观念去观察宇宙,第二是唯物论的观念,谓我们所能认识的,只是宇宙的物质条件。”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正是将这两种观念即唯物论与辩证法合并在一起去解释历史,“完成了科学的历史进化论。”而一些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批评,主要源自批评者的名词误解和观念混淆,尤其是将“物质利益”与“物质条件”混为一谈,而“物质条件”才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历史支配者。^③该刊亦对布哈林的唯物史观进行了批判,认为其“犯了折衷主义的,二元论的错误”,“企图以机械的自然代替偶然而根本抛弃自然”。^④显然,这些文字明晰了唯物史观的内涵,对于受众准确理解何谓唯物史观不无裨益。1931年6月,该刊又发文分析中国的知识阶级,认为“知识阶级其自身不是一个具有统一的阶级利害的严整的阶级”,并把知识阶级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上层知识阶级“几乎全部属于资产阶级”,中层则“多数成为慈善家或人道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者”,下层则只有站在无产阶级战线上才能自救。因而,处在“动荡的时代急流里”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有两条路可选:“不‘上进’到榨取阶级的阵营,分享资产阶级的唾余,便是‘堕落’到无产大众的队伍里,肩起历史的使命,成为变革社会的一员战士。”^⑤这就传播了阶级问题和阶级分析方法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

北京高校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传播为数不多。1931年6月,《燕大月刊》译介了列宁名著《国家与革命》的部分内容,阐述了国家的几个特征:“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特殊的武装队伍和监狱等等”“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国家的‘衰亡’与暴力革命”,结论是:“不经过一次暴力革命,要以无产阶级的国家来代替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不可能的。”^⑥这为中共领导的暴力革命实践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尽管大革命失败了,但即便是在批评共产党时,陈铭枢也不得不认为:“革命是一种潮流,纵政治上—时有不能使人满意之处,但此种潮流的推进,总使向上的一方面走,而渐抵于圆满。”^⑦

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关系,也是当时讨论较多的重要话题。1930年12月,北京高校报刊发文

①《蔡校长十六日之演说 劳工神圣》,《北京大学日刊》第260号,1918年11月27日,第4版。

②《庶民的胜利——李大钊主任在中央公园之演说》,《北京大学日刊》第265号,1918年12月6日,第5版。

③刘长宁:《唯物史观及其批评》,《燕大月刊》第6卷第1期,1930年3月20日。

④茹普:《辩证论与机械论——评布哈林》,《燕大月刊》第8卷第1期,1931年5月28日。

⑤[日]向坂逸郎著、张清业译:《现代智识阶级论》,《燕大月刊》第8卷第2期,1931年6月28日。

⑥[俄]列宁著、桑达重译:《论国家》,《燕大月刊》第8卷第2期,1931年6月28日。

⑦《如何使青年得到出路》,《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5期,1928年11月7日,第4版。

指出:“社会革命,要以民族革命为条件;同样,民族革命,也要以社会革命为条件。”^①换言之,民族革命没有相当的成功,社会革命不易完成;社会革命没有相当的成功,民族革命也不易成就。

其次,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介绍与讨论。面对各种社会思潮的传播,尤其是问题与主义之争尚处如火如荼之时,1919年12月,《北京大学日刊》连续登载杜威有关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演讲全文,演讲题目虽然没有提及马克思主义,但有相当篇幅的内容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杜威提到:“到十九世纪下半期的时候,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盛行一时”,^②指出社会主义学说虽各有不同,“然不外一点,即:‘工商业之最大目的,是社会服务,不是个人发财’”^③。他总结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四个重点:一是私有财产制度当下没有存在的理由,二是经济组织若有激烈竞争则自毁,三是集合资本愈大则贫富差距愈甚,四是一切价值大都由劳动而来。^④至于中国如何发展社会主义,他认为中国彼时处于由简单进步到繁复的时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面临如何保存重要的利源以免落在私人之手和怎样利用现有的各业公所制度保存其好处两个重要问题。^⑤可见,杜威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有所研究并有自己的认识,这一演讲及演讲内容的刊发,对于当时中国人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具有一定影响。

在基尔特社会主义争论中,《清华周刊》登载王造时一文称,“破坏社会的哲学不是真正社会主义的重要部分”,故含有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理论的社会主义运动,不是真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但他也不得不承认,“由现在的社会主义的情势而论,是趋向于革命的社会主义。”^⑥此后不久,1922年10月底11月初,《北京大学日刊》连续刊载福田德三的演讲内容。在演讲中,福田把资本主义分为对内和对外两种,认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是对外的资本主义,而对内的资本主义则是好东西,并以列宁等“都主张对内的资本主义是恢复国内经济状况很有用的手段”作为自己观点的佐证。^⑦福田亦认为马克思所提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剩余价值掠夺”关系理由并不充分。且与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不同,福田认为“人类的历史是掠夺的历史”^⑧。1923年6月,《北京大学日刊》刊载李达著文直接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终形式”。^⑨

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再次兴起社会主义讨论思潮,高校报刊顺势刊文探讨知识界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吴序灿提出,“弱小民族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是必需而且必然的,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他断言社会革命必然爆发,而社会革命一经成功,就是“帝国主义崩溃之时”;^⑩尤其认为即将爆发的二战革命主观动力远比一战强大,这一时期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也远比一战进步,“帝国主义的崩溃,是一种必然的运命”^⑪。罗家伦认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一个阶段的论断过于简单,模恩“以事实做根据,用历史来说明”分析帝国主义才是科学的态度。^⑫

再次,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介绍与讨论。应当指出,北京高校报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仅略有涉及。1921年6月,《燕京大学季刊》登载分析《资本论》的译文,认为其是“社会主义

①吴序灿:《帝国主义的末路》,《燕大月刊》第7卷第1—2期,1930年12月25日。

②[美]杜威、黄绍谷:《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九)》(一续),《北京大学日刊》第508号,1919年12月10日,第4版。

③[美]杜威、黄绍谷:《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九)》(四续),《北京大学日刊》第512号,1919年12月15日,第2—3版。

④[美]杜威、黄绍谷:《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九)》(二续),《北京大学日刊》第509号,1919年12月11日,第3—4版。

⑤[美]杜威、黄绍谷:《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九)》(四续),《北京大学日刊》第512号,1919年12月15日,第2—3版。

⑥王造时:《伊耳武德的“社会问题中的经济元素”》,《清华周刊》第196期,1920年10月29日。

⑦[日]福田德三讲:《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特别注重其与布尔塞维克之关系》(续),《北京大学日刊》第1091号,1922年10月26日,第3版。

⑧[日]福田德三讲:《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特别注重其与布尔塞维克之关系》(续),《北京大学日刊》第1097号,1922年11月2日,第2版。

⑨李达:《何谓帝国主义》,《北京大学日刊》第1277号,1923年6月29日,第2版。

⑩吴序灿:《帝国主义的末路》,《燕大月刊》第7卷第1、2期合刊,1930年12月25日。

⑪吴序灿:《帝国主义崩溃的必然性》,《燕大周刊》1931年第4期,1931年11月23日。

⑫罗家伦:《帝国主义与世界政治译序(一)》,《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142期,1930年2月21日,第2—3版。

的运动中一部拔萃的作品”,并有“社会主义的经书”之称,并对其中的“价值论”部分予以“特别讨论”。^①于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前,《资本论》已在中国传播。尽管该译文是从科学社会主义视角解析《资本论》,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1932年4月,北京高校报刊高度评价《资本论》,认为马克思“用一生的精力来研究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他的经济学,也和他的哲学一样,是人类史上之最丰富,最完善的经济学。”^②总体而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注度低,实在与时代发展密切相关。彼时中国正处于多种社会思潮传播、多种道路选择时期,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尚未有共识,而经济发展问题相对于国家道路选择来说,其重要性显然偏弱。

(二)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讨

在基尔特社会主义争论之后,北京高校报刊逐渐开始关注社会主义的实践问题。1923年4月,《燕大周刊》刊文探讨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江亢虎依据对俄国的亲身考察认为,俄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极力反对知识阶级”,不利于生产的进行,俄国“以小资本主义为无害”,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③同年,《北京大学日刊》刊文谈及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问题。该文结合中国经济现状,认为“产业未发达的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组织,就采用社会主义”,面临国际上、产业上、精神上的诸多困难,尤其“经济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并且最困难的事业,非长年月不为功”。^④

此后,中国革命往哪里去逐渐成为彼时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一方面,北京高校报刊的译文介绍了“八七会议”后中国苏维埃的发展及中共关于农民运动的指导方针: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解决土地问题、展开非苏维埃区域的农民运动等,^⑤尤其强调土地革命为中国革命基本的中心问题。对于土地革命中如何对待富农这一很重要的问题,北京高校报刊主要介绍了日本学者的观点,称中国的富农在本质上与俄国的富农相异,“中国的富农代表着资本主义的关系也代表着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的关系。”中国富农的这种二重性,决定了“革命的农民土地要求的运动……不免要发展向反富农的斗争”,也决定了富农与无产阶级完全联合是不可能的。所以,“依从着俄国十月革命前原则——所谓展开全农民的协同战线;在中国是不能适用的”。因此,中国苏维埃区域内反富农斗争不单是口号,“也不单是为了苏维埃政权中予以财政上的出路,而应该是反对封建的剥削及大众的阶级斗争。”^⑥

另一方面,北京高校报刊发文批评不断革命论,提出中国必须将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战斗,每个劳动者都要明白“中国革命是全世界普罗列塔利亚革命整个历史过程中的一部分”。^⑦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斯大林的“单独一国有建设社会主义可能论”的主要争论点,是“一个国家能否单独地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然而,苏联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国家是能够单独生存的”。^⑧特别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在4年内提前完成,证明劳动阶级既能破坏旧的世界,也能建设新的世界;证明在单独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的社会所要的

①许光迪译:《马克思与近代“科学的”社会主义》,《燕京大学季刊》第2卷第1、2号合刊,1921年6月。

②青光:《纪念“五五”》,《认识旬刊》第三四期合刊,1932年4月20日。

③江亢虎讲、杨文超记:《俄国实行社会主义的状况(续)》,《燕大周刊》第7期,1923年4月7日,第1版。

④郭心崧:《中国经济现状与社会主义》(一续),《北京大学日刊》第1339号,1923年11月14日,第2版。

⑤[日]田中忠夫著、林立译:《中国苏维埃底发展过程》,《燕大月刊》第8卷第2期,1931年6月28日。

⑥[日]田中忠夫著、信达译:《中国富农的特殊性与反富农斗争》,《燕大月刊》第10卷第2期,1934年2月28日。

⑦沙法洛夫著、芹园译:《中国革命往那里去?》,《燕大月刊》第9卷第1期,1932年5月16日。普罗列塔利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

⑧Louis Fischer:《杜洛斯基的世界革命》,《燕大月刊》第9卷第2期,1932年12月16日。

经济基础已在苏联建设起来了。”^①这种认识,既为中共领导的共产革命是实现中国革命目标的正确选择提供了证据,也为共产党内反对不断革命论提供了苏联的实证例子,确证了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是这一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和特点。同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已经“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争取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走向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争取工农兵的民主政权”,最终目的是走向社会主义,因而,“不得不首先争取走向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的存在”,即“完成民族资产阶级所没有完成的任务:推翻帝国主义统治,扫清封建,争取土地革命。”^②这些认识和主张正好契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探索的革命新道路的理论 and 实践。这种“他者”的言说,更加有利于中共革命理论的传播。

1930年前后,西方资本主义爆发经济危机,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却取得了辉煌成绩。社会主义讨论在中国知识界再次兴起,知识分子们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关注空前提高,开始探讨苏联成功的原因以及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1931年,北京高校报刊陆续报道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革命信息,提到“印度革命显然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所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土地革命是目前印度革命的两大基本任务。”^③该文探讨的是印度革命,却难免不让人联想正是指向当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某种程度上为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正当性提供了域外的参照。

至俄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北京高校报刊对俄国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介绍增加,称俄国远东地区经过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文化教育等取得飞速发展^④。苏联农村集体化运动后,农场平均收获至少则增加6成,多则增收3倍,这既得益于农民耕种面积的增加,也得益于生产机械化的发展,从而使得农民收入提高,家畜家禽蓄养数量也大幅增加。^⑤1934年,冯友兰考察苏联回国后讲演称“以在俄印象最佳……足证苏联之进步”,但他认为俄国“现在的制度是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⑥《燕大周刊》刊载布哈林关于俄国经济发展的观点,称苏联生产力的增进一方面得益于新工厂的建设,国际农场和集体农场的进一步的机械化等等;另一方面则得益于新技术的使用,“所有的战线上对于科学的需求特别增大。”^⑦即是说,苏联的建设成就在于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也同发挥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有关。

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方式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渠道之一是创办了大量党报党刊,党报党刊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媒体和载体。高校报刊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媒体与载体之一,其相关内容的刊载类型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 演讲的宣传与内容刊载

近代高校自由民主学风的形成,使各种社会思潮、学说在高校这一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场合广为传播,并相互碰撞、论争。马克思主义也得以通过公开演讲的方式在高校传播。而高校报刊登载的演讲内容,破除了演讲场地和时间限制,扩大了演讲的传播范围与影响力。

从北京高校报刊所登载的各类演讲的信息看,一方面,部分演讲的主题直接同马克思主义密切

①梁诚译:《斯塔林报告第一个“五年计划”之结果》,《燕大月刊》第9卷第3期,1933年4月20日。

②阿荃:《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的经济动向与民族解放运动》,《燕大月刊》第10卷第2期,1934年2月28日。

③欧伦:《印度革命运动》,《燕大月刊》第8卷第1期,1931年5月28日。

④素译:《远东苏维埃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远东区域脱离日本干预和白匪叛乱的十周年纪念》,《燕大月刊》第9卷第2期,1932年12月16日。

⑤低岗译:《苏联农民致史大林书》,《燕大月刊》第10卷第3期,1934年5月12日。

⑥《在苏联所得之印象》,《清华副刊》第42卷第3期,1934年11月5日。

⑦[俄]布哈林著、柯叶译:《苏联经济发展之新阶段》,《燕大周刊》第6卷第11期,1936年2月16日。

相关,显然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推动力。1918年,李大钊的演讲《庶民的胜利》,是他最早宣传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标志。该文因首先登载于当月的《新青年》为众人所知,12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同样刊载了此文。于此可见,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之际,北京高校报刊就属于“在场”。此后,北京大学时有马克思主义主题的演讲。1921年5月1日下午,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邀请李大钊、陈启修、高一涵演讲以纪念五一劳动节,“演题皆关于劳动运动及社会主义各问题”。^①11月2日,北京大学政治研究会邀请高一涵演讲“共产主义历史的变迁”。^②1922年2月19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举行第一次公开讲演会,邀请李大钊讲演“马克思经济学说”。^③5月5日,马克思诞辰纪念日之际,该会又邀请李大钊、顾孟余、陈启修、高一涵发表讲演。^④这些演讲信息校报均有所宣传。另一方面,从所刊载的演讲内容看,部分演讲虽不以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但演讲内容或多或少会涉及马克思主义,体现当时部分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态度和认识。

以清华大学校刊为例,从登载的各类演讲信息看,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演讲数量并不多,而以马克思主义为题的演讲就更少,见表1所示。这些演讲者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既有校内专家学者又有校外人员,他们多数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部分演讲者是国民党的忠实拥趸。从演讲内容来说,演讲者有的从学理角度来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争议,有的从中国社会实际来探讨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可行性,有的站在国民党立场上来质疑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等等。吴鼎昌在演讲中引用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二讲中的观点:“用马克思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⑤,实际上体现了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他们是赞同马克思主义或质疑、反对马克思主义,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即便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蒋廷黻,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相当流行且在一般青年中信奉者众,甚至有位青年对他说,“如要救中国非用共产主义不可……日本也应该行共产主义。”^⑥

表1 清华大学校刊登载的含有马克思主义内容的演讲

日期	演讲者	演讲题目	备注
1928年11月30日	陈达(社会学系主任)	中国劳工问题	经济学会讲演
1929年3月11日	谢瀛洲	中国土地问题(上)	总理纪念周讲演
1929年3月15日	谢瀛洲	中国土地问题(下)	政治学会演讲
1930年3月26日	吴达淦	三民主义中经济理论	经济学会演讲
1930年9月22日	蒋廷黻	游日见闻	总理纪念周讲演
1932年11月25日	张君勱	马克思政治论与中华民国之建设	政治学会讲演
1934年3月1日	张荫麟	唯物史观之批判	历史学会首次全体常会
1934年10月18日	斯曲克伦(英国)	消费者之社团与社会主义 (Consumers Societies and Socialism)	
1934年10月23日	冯芝生(文学院院长)	在苏联所得之印象	现代座谈会演讲
1934年10月29日	冯芝生(文学院院长)	在英国所得之印象	总理纪念周讲演
1935年5月16日	何尔康教授	Karl Marx and 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纪念周会讲演
1935年5月28日	程海峰国际劳动局中国办事处主任	国际劳工组织	
1936年5月25日	严景耀教授(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苏联之政治与经济	
1937年4月20日	贺自昭	辩证法与直觉	哲学系讨论会

资料来源:据《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统计

①《劳动节之北大讲演会》,《晨报》1921年4月30日。
②《政治研究会公开讲演》,《北京大学日刊》第961号,1922年2月18日,第4版。
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五)》,《北京大学日刊》第880号,1921年11月1日,第4版。
④《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晨报》1922年5月2日。
⑤吴达淦先生讲、楚樵记:《三民主义中经济理论(续)》,《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158号,1930年4月2日,第4版。
⑥蒋廷黻讲、文翰记:《游日见闻》,《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205号,1930年9月26日,第2—4版。

（二）图书介绍

动态信息传播是高校报刊的重要功能之一,故各校图书馆或书报社购买的图书信息,均会在高校报刊及时进行动态更新。从报刊发布的图书信息来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已有相关马克思主义书籍如《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共产党宣言》等在校传播。^①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均购买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相关书籍,既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资本论》^②《共产党宣言》等;也有中外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如《费尔巴哈论》^③《唯物史观之批评的研究》^④《唯物史观的改造》《唯物史观经济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劳动经济论》^⑤等,其中,研究社会主义类图书较多,如《社会主义初步》^⑥《社会主义社会学》《社会主义底基础》^⑦《社会主义之意义》^⑧《近世社会主义运动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⑨《社会主义理论学》^⑩;还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问题的图书,如《中国革命史》《中国劳工问题》《中国劳动问题》^⑪《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⑫等。此外,亦有部分介绍国外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图书,如《俄国劳动运动史》《英国劳动阶级运动史》《苏俄劳动保障》^⑬等。

这些马克思主义类图书,少数为经典著作的翻译,多是相关学术著作的翻译,而著者为日本人的较多,部分为中国人所编撰。

北京高校报刊也对部分图书作了具体的介绍和评价。《清华周刊》就曾评价日本幸德秋水著、高劳译的《社会主义神髓》,称其“能提纲挈领论列社会主义之要点,举凡社会主义之起原,社会主义之能力功用,社会主义之运动状况,均略道梗概,精采处甚多,真不愧得其社会主义神髓之名也。”为此,列举了该书一段精彩的内容。^⑭ 就清华大学图书馆来说,1931年购买的马克思主义类图书比起1921年有大幅增加,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影响有相当大的扩大,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由初步传播到广泛传播的客观现实。需要指出的是,高校报刊所登载的马克思主义类图书信息,当然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具有一定价值,但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类图书占比并不多。

（三）译文摘录

马克思主义曾经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译文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就显得非常重要和必要。这些译文大致有两类,一类是译著,一类是译作。因而,北京高校报刊所登载的译文,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方式之一。

以燕京大学报刊所登载的译文为例,见表2所示,高校报刊登载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内容,有很大一部分是译文的直接摘录,这些译文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政治变化、苏联苏维埃的发展情况等。但从译者或编者的附志来看,这些译文通常都是作为一种观点供读者参考,而非表达明

①《校闻:书报社》,《清华周刊》第196期,1920年10月29日。

②《新编中日文图书目录》(六),《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16号,1931年9月30日。

③《图书馆新购书籍一览》,《女师大旬刊》第5、6期合刊,1931年2月20日,第28页。

④《本部图书馆新增图书一览》,《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第二部旬刊》第14期,1931年5月10日,第17页。

⑤《新编中日文图书目录》(六),《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16号,1931年9月30日。

⑥《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第10期,1924年,第19页。

⑦《图书馆新购书籍一览》,《女师大旬刊》第5、6期合刊,1931年2月20日,第26、27页。

⑧《图书馆二月份新购图书目录》,《女师大旬刊》第8、9期合刊,1931年3月20日,第15页。

⑨《本部图书馆新增图书一览》,《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第二部旬刊》第14期,1931年5月10日,第15、17页。

⑩《本部图书馆新增图书一览》,《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第二部旬刊》第17期,1931年6月10日,第8页。

⑪《图书馆新到书籍》,《燕京大学校刊》第1卷第11期,1928年11月23日,第2版。

⑫《新编中日文图书目录》(六),《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16号,1931年9月30日。

⑬《新编中日文图书目录》(六),《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16号,1931年9月30日。

⑭《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第11期,1924年,第18页。

显的意识形态倾向性。译者附志中所提及的“哲学家的眼光”“缜密的观察”^①“纯理论之探讨”^②“精深独到的研究”“忠实的检讨”^③等,是译作的学术或学理价值;“很大帮助”^④“现代青年所不可不读”^⑤“关心此问题的作参考”^⑥等,则体现译作的重要现实意义。也正是基于此种参考目的,北京高校报刊不仅会刊载不同学科的译文,也会选取观点相异甚至迥然不同的译文同时刊载加以对比,供读者参考。1930年5月,《燕大月刊》登载了《美国人眼中之共产主义与苏俄(二篇)》,“译者附志”就特意指出:“二文对于苏俄与共产主义均有明晰的认识,而观点则迥异,故特译,聊供参考。”^⑦因此,不仅译文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方式,而且这些译者的说明同样为马克思主义相关译文发挥了相应的导读作用。1931年6月,《燕大月刊》刊登的一篇译文的作者为美国教会一位主教,译者说:“他身为主教竟敢‘背叛’教会作反抗宗教的斗争,这非具有极大的认识,是不能出此的”,体现译者对作者撰写此文的肯定态度。同时,译者指出这位主教关于唯物论的观点存在“严重的错误”,“第一,他把马克思偶像化了,‘神’化了。第二他把马克思主义局限得好像只剩了社会主义学说的一部分。”究其原因在于主教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是静止的、孤立的、永远不会演变的教条,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伟大的哲学基础——辩证法唯物论的上面。”^⑧译者的文字说明,不乏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观点,从而能够帮助读者客观阅读和正确理解译文,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是有益的。

表2 《燕大月刊》登载的马克思主义相关译文

著者	译者	篇名	期号	时间(年)
Rudolf Eucken	佐之译;冯友兰校	社会主义问题之历史	第1卷第1期	1927
I. Stalin	胡庆育译	无产阶级独裁制论	第5卷第3期	1929
史塔林	胡庆育译	无产阶级独裁制论(续)	第5卷第4期	1930
	双桐译	美国人眼中之共产主义与苏俄(二篇)	第6卷第2期	1930
	可洙译	资本主义国家之不平衡的发展	第8卷第1期	1931
列宁	桑达重译	论国家	第8卷第2期	1931
向坂逸郎	张清业译	现代智识阶级论	第8卷第2期	1931
Brown	梁宅译	上帝,科学与马克思	第8卷第2期	1931
田中忠夫	林立译	中国苏维埃底发展过程	第8卷第2期	1931
乌梁诺夫	超麟译	论民权独裁	第8卷第3期	1931
布夸若斯夫	可洙译	马克思底农业理论与实施	第8卷第3期	1931
布夸若斯夫	可洙译	马克思底农业理论与实施(续)	第9卷第1期	1932
沙法洛夫 ^⑨	芹园译	中国革命往那里去?	第9卷第1期	1932
Louis Fischer ^⑩		杜洛斯基的世界革命	第9卷第2期	1932
	素译	远东苏维埃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远东区域脱离日本干预和白匪叛乱的十周年纪念	第9卷第2期	1932
	梁诚译	斯塔林报告第一个“五年计划”之结果	第9卷第3期	1933
Sidney Webb ^⑪		苏维埃治下的自由	第9卷第3期	1933
渥里弗逊	信达试译	理论与实践	第10卷第2期	1934
田中忠夫	信达译	中国富农的特殊性与反富农斗争	第10卷第2期	1934
	低岗译	苏联农民致史大林书——他们怎样认识集体农场	第10卷第3期	1934

资料来源:据《燕大月刊》统计

①Rudolf Eucken 著,佐之译、冯友兰校:《社会主义问题之历史》,《燕大月刊》第1卷第1期,1927年10月19日。

②[俄]列宁著、桑达译:《论国家》,《燕大月刊》第8卷第2期,1931年6月28日。

③Louis Fischer:《杜洛斯基的世界革命》,《燕大月刊》第9卷第2期,1932年12月16日。

④Rudolf Eucken 著,佐之译、冯友兰校:《社会主义问题之历史》,《燕大月刊》第1卷第1期,1927年10月19日。

⑤[俄]列宁著、桑达译:《论国家》,《燕大月刊》第8卷第2期,1931年6月28日。

⑥Louis Fischer:《杜洛斯基的世界革命》,《燕大月刊》第9卷第2期,1932年12月16日。

⑦双桐译:《美国人眼中之共产主义与苏俄(二篇)》,《燕大月刊》第6卷第2期,1930年5月10日。

⑧Brown 著、梁宅译:《上帝,科学与马克思》,《燕大月刊》第8卷第2期,1931年6月28日。

⑨乔治·萨发洛夫,俄共代表之一,参与领导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东局的工作,负责中国事务。

⑩路易斯·费希尔,美国记者兼作家,是俄国问题以及印度和中东问题的权威。

⑪悉德尼·韦伯,英国社会活动家、政论家。

此外,北京高校报刊刊登了一些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的信息。以北京大学为例,1922年,李大钊给政治系讲授《现代政治》之“工人的国际运动”^①,1923年,讲授《唯物史观》^②。此外,他开设《史学思想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等课程。^③1925—1926年度,政治学系开设《社会主义史》及陈启修讲授的《新俄法制及政治》课程。1935年度,卢郁文讲授《劳工运动及社会主义史》,秦瓚讲授《马克思学说研究》。^④不过,相对前述几种传播方式而言,北京高校报刊所刊登的课程信息内容较少。

三、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特点

通过对北京高校报刊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和方式之探讨,可以看出,高校报刊不同于党报党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现出高校的特色,具有自身的特点,具体而言,大致有以下这几个方面。

(一) 间接传播为主

纵观北京高校报刊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可以认为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以间接传播为主,主要体现在传播主体和传播内容两个方面。

传播主体方面,体现为先进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在高校报刊直接撰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比较少,其他知识分子撰文阐述观点时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比较多,意味着高校报刊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是其他知识分子。这主要是因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组织在北方及北京高校均处于极为隐蔽状态,所以,先进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甚少发表公开言论传播马克思主义。

传播内容而言,一方面,直接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内容比较少,阐述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认知和观点的比较多,结合中国实际或俄国革命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探讨马克思主义是否具备可行性的比较多;另一方面,刊载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的观点摘录比较多,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传播比较少;此外,关于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译文比较多,尤其是来自日本学术界的译文比较多,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文比较少,虽然这些学术研究的译文同样有不少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观点摘录的内容,但毕竟不是经典著作的直接译文,无疑是属于间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经典。

(二) 侧重学理探讨

从北京高校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来看,相当部分的知识分子仍然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当时各种社会思潮、学说的其中之一,对其进行学理上的探讨,国外学者的译文同样如此。正如前文述及一篇“特别讨论”《资本论》一书的价值问题的译文。该文从五个方面展开讨论:“1 这种价值论,颇自抵牾”“2 若马克思的价值论施用在土地上,事实上恐怕讲不下去”“3 马克思的理论关于由人工造的东西上反对普遍的经验”“4 这个理论忽略了价值中应当研究的种种要素”“5 马克思要想法把用的价值和交易的价值的界限,弄个清楚,但他那个界限总未得存在,其实也用不着那个东西”。^⑤不难看出,该文不赞同甚或反对《资本论》关于价值论的一些认识,但多是从学理层面

^①《政治学系教授会启事》,《北京大学日刊》第964号,1922年2月22日,第1版。

^②《注册部公告》,《北京大学日刊》第1235号,1923年5月10日,第1版。

^③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97页。

^④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 第二卷:1912—1937》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47、1149、1175、1176页。

^⑤许光迪译:《马克思与近代“科学的”社会主义》,《燕京大学季刊》第2卷第1、2号合刊,1921年6月。

加以分析,而不是简单地基于意识形态因素进行考虑。类似的学理探讨既有中国学者的著作,也有相当多外国学者的译作,且从译作能够看出当时国外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研究在日本学者中较为热门。

尽管这些侧重学理的讨论广泛引用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内的多位学者的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北京高校报刊登载的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认知与观点,的确有一部分内容是在批评、质疑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罗家伦为《帝国主义与世界政治》一书所作的译序首先就是基于意识形态,然后再进行学理分析。罗家伦既认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的一个阶段”的观点是“简单的断定”,也指出,模恩教授亦反对帝国主义,承认帝国主义“增加人类无限的纠纷和痛苦”,但罗氏却认为模恩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很守科学态度”^①。这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北京高校报刊是当时各种思想或思潮百家争鸣的学术平台之一,而马克思主义只是被当作了“百家”的一分子。北京高校报刊对马克思主义学理性研究内容的传播,更加符合和体现高校的特点及优势,也会对高校的知识阶层产生更大的影响。

(三) 差异性明显

北京高校报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存在明显的差异。有的高校报刊刊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相对多些,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有的高校报刊刊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相对少些,如北平女子师范学院、中法大学;有的高校报刊刊载传播马克思主义演讲的消息和内容多些,如《国立清华大学校刊》;有的高校报刊登载马克思主义相关译文多些,如《燕大月刊》。

北京高校报刊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译文差异较为突出。受时代和认知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马克思列宁主义等专有名词的翻译尚未统一,存在一定差异在所难免。如,马克思译为马克斯^②、马克司^③、麦尔克思、麦尔克斯^④;恩格斯译为尹格尔^⑤、安格尔斯^⑥、恩格尔^⑦、昂格思^⑧;列宁译为李宁^⑨、伊里奇^⑩、乌梁诺夫^⑪;斯大林译为史塔林^⑫、斯塔林^⑬、史大林^⑭、史泰林、施大麟。马克思列宁主义译为马一伊主义^⑮,马克思主义译为马克斯主义^⑯,布尔什维主义译为宝雪维几主义(Bolshevist)^⑰。资产阶级译为布尔乔亚,无产阶级译为普罗利他利亚^⑱、普罗利塔利亚特^⑲、普罗列塔利亚^⑳,无产阶

①罗家伦:《帝国主义与世界政治译序(一)》,《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142期,1930年2月21日,第23版。

②《校闻:书报社》,《清华周刊》第196期,1920年10月29日。

③许光迪译:《马克思与近代“科学的”社会主义》,《燕京大学季刊》第2卷第1、2号合刊,1921年6月。

④渥里弗逊著、信达译:《理论与实践》,《燕大月刊》第10卷第2期,1934年2月28日。

⑤许光迪译:《马克思与近代“科学的”社会主义》,《燕京大学季刊》第2卷第1、2号合刊,1921年6月。

⑥刘长宁:《唯物史观及其批评》,《燕大月刊》第6卷第1期,1930年3月20日。

⑦胡宜斋:《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中法月刊》第3卷第1期,1933年。

⑧渥里弗逊著、信达译:《理论与实践》,《燕大月刊》第10卷第2期,1934年2月28日。

⑨[日]福田德三讲:《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特别注重其与布尔塞维克之关系》(续),《北京大学日刊》第1091号,1922年10月26日,第3版。

⑩渥里弗逊著、信达译:《理论与实践》,《燕大月刊》第10卷第2期,1934年2月28日。

⑪乌梁诺夫著、超麟译:《论民权独裁》,《燕大月刊》第8卷第3期,1931年12月15日。

⑫史塔林著、胡庆育译:《无产阶级独裁制论》(续),《燕大月刊》第5卷第4期,1930年1月20日。

⑬梁诚译:《斯塔林报告第一个“五年计划”之结果》,《燕大月刊》第9卷第3期,1933年4月20日。

⑭低岗译:《苏联农民致史大林书》,《燕大月刊》第10卷第3期,1934年5月12日。

⑮渥里弗逊著、信达译:《理论与实践》,《燕大月刊》第10卷第2期,1934年2月28日。

⑯[日]福田德三讲:《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特别注重其与布尔塞维克之关系》,《北京大学日刊》第1090号,1922年10月25日,第3版。

⑰尤慈爱:《共产主义能否适用于中国》,《燕京大学季刊》第2卷第1、2号合刊,1921年6月。

⑱茹普:《辩证论与机械论——评布哈林》,《燕大月刊》第8卷第1期,1931年5月28日。

⑲[日]向坂逸郎著、张清业译:《现代智识阶级论》,《燕大月刊》第8卷第2期,1931年6月28日。

⑳[俄]布夸若斯夫著、可浊译:《马克思底农业理论与实施》(续),《燕大月刊》第9卷第1期,1932年5月16日。

级专政译为普罗列塔利亚专政^①、普罗里他利亚专政。这些译文的差异性,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时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翻译水平。当然,当时即便共产党人对这些译名尚不是完全统一的,只不过译文的差异性没有这样明显。

北京高校报刊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差异性还体现在时间上。通过对相关资料的爬梳发现,北京高校报刊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相对较多地集中于两个时间点:一个是中共成立前后,另一个是1930年前后。这种时间差异性,既同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总体趋势相一致,也与当时国共关系及中国革命发展紧密相关。

四、结 语

1917—1937年间北京高校报刊的内容相当丰富,马克思主义传播只是其中之一,甚至对高校报刊来说并不是主要内容,尤其像燕京大学这样的教会大学。为此,开展北京高校报刊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需要准确把握这一基本情势。然而,这一时期北京高校报刊都会或多或少涉及一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同样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特别是《燕京月刊》登载了一定数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译文颇令人意外。

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是极为复杂的历史进程,毫无疑问,先进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是传播的主力军。尽管如此,我们亦不能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的作用或贡献。就北京高校报刊马克思主义传播而言,部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通过演讲、著作、译作等方式刊登于高校报刊,不管其是赞同或质疑、反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均可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间接传播。这些知识分子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都有比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像蔡元培、杜威、冯友兰、蒋廷黻、张君勱、张荫麟、吴鼎昌等,是中外学界或业界的翘楚,他们的演讲或译文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对马克思主义间接传播的社会影响不容忽视。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严格控制新闻舆论,企图严控共产党发展壮大。1930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甚至颁布了《整顿学风令》,要求“奉总理三民主义为依归”^②,查禁校内传播马克思主义。这确实对先进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在北京高校传播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因而,高校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的间接传播显得难能可贵,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者的“不在场”。因此,北京高校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性间接传播,或可视为中间地带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这种中间地带,一方面体现在其传播主体处于中间地带,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数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国民党人,既不是纯粹的信仰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纯粹的信仰三民主义者;另一方面体现在其传播渠道处于中间地带,北京高校报刊既不属于中共党报党刊,也不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报刊;此外还体现在其传播内容处于中间地带,这些内容不是单纯地从意识形态视角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从学理和学术上、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介绍和探讨马克思主义。

需要指出,从1917—1937年北京高校报刊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性探讨来看,这些探讨或结合了中国国情,或考虑了世界大势,但仍然没有深入中国社会,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了解不够透彻,最终影响了高校报刊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实际效果,也反应了北京高校报刊和部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实际价值。同样,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零散而不是系统的,是局部而不是全面的,无法取代和超越先进知识分子及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

①[俄]沙法洛夫著、芹园译:《中国革命往那里去?》,《燕大月刊》第9卷第1期,1932年5月16日。

②《国立北平大学训令字第六二八号》,《女师大旬刊》第1期,1931年1月1日,第14页。

新时代,高校仍然是思想传播和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高校报刊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和研究的学术阵地,要视登载研究、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成果为刊物的重要职责和初心使命,要继续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理研究和学术探讨提供渠道,不仅要守土有责,而且要守土尽责,努力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高校报刊人的智慧和力量,发挥高校报刊的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叶 忠)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in the Intermediate Zone: A Study Based on the Data from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in Beijing from 1917 to 1937

LIN Xuwu

Abstract: From 1917 to 1937, the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where intellectuals were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became one of the key venues for the dissemination and study of Marxism. The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in Beijing served as vital platforms and chroniclers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during this period. The main content of Marxism disseminated through these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included Marxist philosophy,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scientific socialism. However, Marxism was more often treated as a doctrine or a philosophical and economic theory for study and dissemination. The primary methods of dissemination included lectures, book introductions, and translated excerp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dissemination were predominantly indirect, with a focus on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notable differences in interpretation. The academic research and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conducted by the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in Beijing and some intellectuals can be categorized as dissemination within the intermediate zone, which faced issues such as being scattered rather than systematic and partial rather than comprehensive.

Keywords: Beijing;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About the author: LIN Xuwu, PhD in History,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